

資中筠自选集

感時憂世

资中筠自选集

感時憂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时忧世 / 资中筠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6-2

I. ①感… II. ①资…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40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编: 256401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5千字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

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

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

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人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

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

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了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

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目 录

自序 / i

也谈“中国模式” / 001

岁末杂感致友人 / 011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 017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 020

千条万条，反腐败是第一条 / 026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 035

叫停“形象工程”此其时矣！ / 043

可否慢一点奏凯歌？ / 046

我的困惑 / 050

灾后感言 / 059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 069

问题关键在哪里？ / 075

——也谈收容制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 079

优生还是怪胎? / 087

“小骂大帮忙”新解 / 092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 095

“非典”与“五四”精神 / 101

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 / 108

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 / 113

——作为受众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企盼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 119

我们的“文化”怎么啦? / 139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 146

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 152

大学“评估”之弊 / 163

中国人还是应先学好中文 / 169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 173

——也谈学术腐败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 182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 189

人格与国格孰先？ / 199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 203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 208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 214

有感于冯友兰先生的“反刍” / 225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 / 229

也谈“中国模式”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美欧国家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所以争论不断。“中国模式”之不可恃，不少经济界专家已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不必再重复。不过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论述。

实际上，当前“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就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如果拨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框架”和可疑的数字，直

面六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现实，根据五亿到十三亿（现在可能不止）的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来分析，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看法。究竟后三十年的成就是前三十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三十年成就很大，后三十年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的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最后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这是包括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亲历和感受。否则，就无所谓“改革开放”。

二、接下来的问题是后三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是尚未改动的所谓“举国体制”以及国营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了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于是成了巩固和加强当前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近代史的事实。我们开始走向现代化至少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则已经走了一百七十年，不能无视超过一个

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和积累的成绩——不仅是物质领域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思想领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前的再起步绝不是紧接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古代），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回首当年，如果我们从六十年前就遵循这条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不必付出如此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大规模破坏、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三年内战，建设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之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走出谷底，到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紧接着又几经折腾，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从“文革”后的最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的百分比。

何况，这一次的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三十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